

正

視

發刊辭

本刊籌備匝月，始行問世，出版前固然歷經艱苦，即出版後，當此風雨如晦之日，處境之遑迤，或有勝於出版前之艱苦者，但我們感覺今日之青年，陷於兩種不同的途徑，一為消沉麻痺，樂天命的混混沌沌，流入了自我享樂的道途，一為剛強偏激，以意氣鼓動感情，以感情來輕率妄動，二者皆使青年氣氛，鬱沉而無生氣因此我們目擊心傷，感覺當前非有公正，沉毅，嚴肅的言論，不足以挽此頹風，於是不顧一己的得失毀譽，盡其良知，善達自己應有之責任，毅然出版此刊茲乘初刊特揭出我們的志趣和態度，以供讀者指導。

（一）我們的態度，是去蔽存誠，蔽在俗語即所謂成見，大凡一人心理上一切先在的狀態，如意志、情慾，見解，致影響對後來事物刺激的反應，失諸過度，或失諸不足，皆為蔽之患害，荀卿對此說得最明白，「曲知之人，觀於道之一隅，而未之能識，故以為足而飾之，內以自亂，外以惑人、上以蔽下，下以蔽上、此蔽塞之禍也」。概括一句來說，由主觀態度看事物，必有矇蔽，而難透視惟客觀的態度，始足心如槃水、正錯而勿動，我們辦刊物之目的，是學習而非發表，是替衆人作喉舌，非一己之私，嘵嘵相詬，因此我們的態度必須客觀，不能蔽於一曲，而闕於大理，惟其如是，才不會內以自亂，欺騙自己，說昧諸良知的話，更不會外以惑人，將讀者作工具，為宣傳的對象。但是怎樣達到去蔽的目的呢，孔子的答覆是毋意，毋必，毋固，毋我，亦即大學所謂正心誠意，我們非談儒家哲學，故不必深論，

但須承認正心誠意是救蔽之良方，但現時代的正心誠意，不是斗室危坐，主敬中求得到的，必須以大家的心爲心，以大衆的意爲意，仔細默察，羣衆的思想朝那個方向走，羣衆的痛苦蘊藏在何處，以羣衆之心，求正我心，羣衆之意，以誠度之，如此然後能客觀立論，庶無偏頗，而免過激與不足的反應。

(二)我們的信仰、是真正的民主，今日衆曉戶喻，皆知惟民主始可促成中國進入復興之途，同時人人皆以民主兩字相號召、即從國際的眼光看，皆盼中國能實行民主，穩定世界和平，但民主真正意義何在，答者皆唯唯否否，莫明所以，於是奇說淫辭，踵相撓滑，而民主之義，從此亂矣，我們信仰的民主，非一黨專政之民主、由一黨壟斷，變造民意、致縣市議會，失其意義，或一黨挾其武力，任意撲殺格打，鋤諸異於我者，此種民主爲僞民主，我們更反對一階級專政之民主，在其勢力範圍以內，鎔鑄其民衆於一個模型之中，有黨性而無民族性，此種民主我們亦猛烈抨擊，同時我們瞧不起政治掮客們所唱之民主，他們以民主作利祿之階，其主張並未建築於民意上，此種民主亦非我們所能容忍，我們認爲莫正之民主，乃尊重人民之人格，養成獨立之公民，使其有養有教，然後選舉時，對於政府自知贊成與反對，各黨派聽從人民之命令，非由各黨派自認爲「家主」人翁，此種民主，爲我們所信仰。

(三)我們的要求是自由與理性，自由的意義不是放縱，乃是守法，但法律須先保障人民的自由，並使人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，苟法律能保障人民的自由與權利，則人民必守法與護法，同時政府應該尊重人民的人格，而自由即爲維護人格完整所必要，政府應該使人民的身體的，智惠的，及道德的能力，作充分優性的發展，而自由即爲達成此種優性所不可缺

少的條件：本刊爲人格者，希望政府及學校方面，給予充分自由，俾能優性的發展，同時理性是人類最可寶貴的素質，教育最大目的，亦即在發揮人類理性，無理性，社會不能安定，文化不能進步，現在中國到處都憑藉衝動及強力來解決糾紛，即學校裏面亦動輒動武，意氣用事，抹殺理性，這爲我們所反對的。

我們既以客觀爲態度，民主爲信仰，自由與理性爲要求，則我們尊重自己的人格，不作徧激衝動，不作消沉的指斥，同時我們亦尊重別人人格，指導者爲我師，批評者爲我友，相期相砥，共同達成增輝文化的使命。

歐先生領導大夏往何處去——紀念

六一校慶作

曹國中

六一校慶，這日子，每個大夏人都應有其興奮與喜悅，沒有喜幛錦屏賀禮的人，就以文章來紀念吧，這文章不是善頌善禱的祝辭，亦非清聲綺麗的韻文，僅僅寫述一個領導大夏者過去的舊迹及對他將來。熱烈的仰望，伊人爲誰，即今天大夏大學校長——歐元懷博士。爲甚麼紀念校慶，要拿一個人物來作題材呢，因爲歐先生與大夏的關係是不可分離的，有歐先生，才有大夏，有大夏，必有歐先生，對其過去的往蹟，將來的期望，也就是對大夏的懷念，對大夏的期望。

歐先生是大夏三位創辦人之人，也是會對大夏負責實際責任的三位校長之一，大夏的三個創辦人，是歐先生，今日的王副校長及傅式說，傅式說已成待死之囚，犧牲了他的生命，同時也埋葬了他過去的功績，王副校長呢，翊贊中樞，嘉猷獻替，國事分去了對校事的關心，歐先生則同大夏廿三年來的締造，首尾終始，息息相關，歷任大夏的校長是馬君武先生及王伯羣先生，馬先生帶着他個人應有的盛譽，永遠安息了，王先生則在國府明令褒揚下，亦默默地逝世了，只有歐先生仍然挺立於風雨中，繼續支持着大夏，三者均有令人謳歌，不可磨滅的功績，而歐先生肩當重任，艱難困苦，倍勞於前者，合創辦人及負責實際責任人於一身

，孜孜地辛苦了廿三年，其關係之深，大夏固屬空前絕後，就是各校校史上，亦難發現其例，所以以歐先生爲中心，而寫出對大夏前途的希望，再合宜也沒有了。

歐博士，歐廳長，歐校長，歐先生，都是社會人士以不同的身份對他的稱呼，歐博士是各學者間對他的尊號，歐廳長是他政治上的地位。今天筆者以學生的身份，應該稱呼校長，可是歐先生三字，是廣大校友羣的口頭禪，今天筆者權且檢拾起這稱號，把自己的身份，提進一步吧，因學生立場，是無法客觀立論的。

記得前年六一校慶的前夕，時學校在赤水，廣播中發表了歐先生爲善後救濟署黔南示範區主任，於是全校震動，疑譏紛紜，說他拋離大夏，將做官去了，翌日在鄉邦碩彥，賓客幅幙的莊嚴典禮上，他說了兩句淚與聲俱的話。生爲大夏人，死爲大夏鬼，這話在感情的方面看，是够悲壯的，然也道出了他一生的心情與志願。

歐先生一生光陰，除求學期外，可說全部盡瘁於大夏，雖然政府幾次想借重其才，作教育行政，溥澤多士，然而都婉辭了，湖北教育廳長，教育次長，無論社會人士怎樣熱望與推挽，都輕輕一笑的過去了，最後在貴陽對校內的事頗鬱抑而進入灰心，吳達銓先生乃乘此機會，三顧草廬，挽其出主教育行政，這一般事實，在他個人心中是認爲不幸的，也是不得已的。

在以前歐先生都是以副校長的名義與大夏聯繫着，直至卅四年冬，方拜命校長，這時學校栖皇莫泊，風雨翻搖，處於存滅絕續的關頭，歐先生慷慨受命，馳赴赤水，於毫無所恃的條件下，將學校建立起來，凡到過赤水的同學，總無法忘記，他是黎明中領導同學作升旗典

禮，並有一刻鐘精神講話，安慰同學於不堪忍受的環境中，潛心學業，黃昏日落，他才挾着皮包、走回離校三里外的鄉下去。這一切說明他對大夏有鑒而不捨的精神，及真誠無二的愛護。

我記得黔南事變時，學校遷離貴陽，將卜居赤水，當時我很想轉學他校，因為學校以後的情形，太不能想象了，於是我和一位大學教授，商量。以定行止，這位教授對我誠懇的說『歐先生接任校長後，大夏是更有前途的，你安心去吧』，這說明社會人士對歐先生的看法。

校友們對歐先生更是熱烈萬分，在貴陽歡送會上，校友會贈資送他一套服裝，以示欽慕愛戴之忱、勝利之後，來上海視察滬校，成千的校友，無論識與不識，皆狂熱地包圍他而歡迎着，要校友出錢就出錢，要校友出力就出力，真所謂杖履所至、校友們皆要說不出的欣慰與熱烈，他們愛護母校，同時相信歐先生領導大夏。一定更有前途。

歐先生除了大夏，在各方面都是成功的，因為他具有卓越的才能，整理上海中學，就成為全國最有名的中學，五年的貴陽教育行政，使該誦之聲，遍於荒鄉僻壤，貴州文化為之一新，誰能懷疑他的才能呢。

歐先生是教育博士，也是全國有數的教育學者，全國大學校長中以教育學家出任的，恐不多見，張伯苓先生是學海軍的，吳有訓先生是學物理的，其餘以黨起家，作大學校長的更不可勝數，獨他是學教育，辦教育，誰說他領導大夏，無懷抱，無特見呢。

歐先生既以學者身份，卓越的才能，生而後已的志願，鞠躬盡瘁的精神，復得社會人士

的信仰與支持，倒底大夏今日的情形是怎樣呢，歐先生自己是有答覆的，在上學期開學典禮中說道。要將大夏辦得像個樣子的大學，某次週會上他又說道。『要拚了這條老命』。

這話不知是謙辭，也不知是對自己的鼓勵，多麼蒼涼而心酸呵，二十三載的韶華，流得也不算短，往事狼烟，那堪回首，我不禁爲歐先生流下一兩點惋惜之淚。

歐先生美豐儀，嫻辭令，然而二十三年的辛勤，在他臉上刻劃着一條條的年輪，積年的重擔，壓灣了背部，歐先生老了，雖然信誓旦旦，要將大夏辦得像個樣子，但是，美人遲暮，能不爲之愴然呢，我每在圖書館內看到他青年時代的照片。當年公謹，風度翩翩，想當時領導兩百多廈門大學青年，來上海創辦大夏，意氣之盛，一時無殊，然而江山依舊，歲月無情，縱然歐先生老淚滂沱，也鉤不轉這逝水流年啊！

筆者不是來寫傳記，也不必考據歐先生家世，然聽見人家說他是基督徒，是從窮苦的家庭中奮鬥出來的，因此我常常暗中竊怪，歐先生既生於憂患，爲甚麼辦理大夏，却如此富麗堂皇，成爲王孫公子，走馬少年，優遊優息之所呢，筆者始業於貴陽，續業於赤水，隨學校遷移來上海，就空閒言，經歷了三個地區，就時閒言，遭逢了大夏的蒙難學期與復興期，會看到大夏在破廟舊寺中上過課，今天又看到巍峨高舍，流水曲橋，難道這梵皇渡幽雅的校園，就是歐先生想像中的樣子嗎。

歐先生的母校是哥倫比亞大學，哥倫比亞是以教育學院及自由空氣出名的，大夏的教育學院過去一度會享盛名，而且延攬過不同思想的學者，萃於一隅，講學論道，因此有人比擬大夏爲中國的哥倫比亞，筆者沒有到過美國，是耶，非耶，不得而知，不過今天的大夏是沒

有一點自由氣氛的，如果歐先生想像中的樣子是哥倫比亞大學，則距離太遠了，而且沒有絲毫些影迹。

自由空氣的解釋，並不是放蕩縱容，真正的意義，是在學術上自由的探討與研究，介紹各種不同的思想與學生，供其選擇，同時補充並完成其人格，使其有選擇的能力，北京大學，就是這類型的大學，北大能够成這個樣子，端賴蔡元培先生的領導，蔡先生胸襟恢大，各種不同思想的學生和教授，皆能兼容並包，蓄於一處，因此北大的學術空氣，是特別濃厚的。

大夏要更有前途，必須走上自由研究的道路，這條路如何走上去，先決的條件，必須歐先生是個真正自由思想主義者。

今天大夏無疑的存在許多不同思想的學生與教授，希望歐先生以恢弘的氣度，廓然大公的精神，同時誘導其發展起來。

歲月倏忽，大夏辦理迄今又二十三年了，雖然時日很長，但大夏沒有衰頹下去，依然欣欣向榮，就歐先生個人論，雖然老了，但在世界偉大的教育家裏面，還是年青的，歐先生說要將大夏辦理像個樣子，我們堅信其必能達到目的，但歐先生領導大夏的路線，是往那個方向走呢？

論『思想自由』

平 剛

『思想自由』一辭爲衆人所曉喻，然而作精細的研究，則覺其蓄理至深，本來思想在個人腦中並無所謂自由與不自由，但爲甚麼會有思想自由這問題發生呢，按這問題是指接受思想與發表思想是否須受外來力量的干涉，『入呼耳，箸乎心』苦受控制，則無能思想自由之可言，譬如說清朝乾隆時代焚燬禁書，使人對某部份書籍某部份思想無接觸的機會，換言之，即圈出特定或法定的思想，硬逼着你接受，則思想是不自由的，再進言之，今天學校所列課程裏，講經濟學一定是介紹資本主義的商品經濟，而忽略人類共同勞動過程中，自會生產過程中，所發生人與人的社會關係，並且視爲禁說，噤不敢言，講哲學亦撇開唯物論辯證法不談，在這種情形，就思想自由的消極方面說是不自由的，至於『出呼口，形乎動靜』。而橫受干涉，更爲顯而易見的事實，不必深論，因此得一結論，思想自由不是關於思想本身內容的問題，乃是一個思想在社會上努力的問題，以此牽涉到政治，同時涉及於文化，茲分別論述之。

思想自由與民主政治是息息相關的，無思想自由即無民主政治之可言，此由甚明，但思想自由在民主政治中，占有何等地位，有人說僅爲民主政治之條件之一而已，其實不然，須知民主政治不僅是一種制度，乃是一種生活，此種生活之養成，非一紙憲法所能蹴就，而思想自由就是胎育民主生活之母體，魚必須在水中生長，而民主生活必須於思想自由中培植，

先有思想自由，然後有民主政治，中國自辛亥制憲以來，迄今較十年，而不能有成者，即無民主生活方式，這是就政治方面論述的。

我們須知，歐美的文化是從思想自由開放出來的，在以前他們的思想受宗教的束縛，文藝復興就是爭思想自由的轉捩點，其後政治壓迫思想，如近世獨裁專制國家之施爲，乃成爲近世爭思想自由之對象，歐美民主先進國家，未嘗以政治干涉內心的生活，僅盡職於共同秩序之維持。在秩序與和平云下一切切聽個人自由發展，這種自由主義發展的結果，促成近世歐美文明的燦爛，此爲思想自由與文化之關係。

其次再論思想自由與教育，我們知道一個人達了進大學的年齡，即當承認其有獨立自尊的人格，因爲人性是不能泯滅的，何況進大學以後，已有獨立之思想與懷抱，因爲充分的認識，已經成熟了他的思想，如果教育的方針，想將學生如軟泥一樣，可隨匠心而彫塑成某種形式，這根本是一種瘋狂的妄想，獨裁與專制者，即想以教育爲手段，來蹂躪人性，變易改造學生的思想，符合其一定之目的，誠然教育是可以改變人性，但其功能是有有限度的，須知教育只是對於人格的完成，對人格的補充而已，所謂造士並不是造成那類型的人物，乃是造就普通人，普通人者就是有眼能見，有心能思，有是非能辨之謂，如此便成爲一個獨立的人，而此種人決非供御用而造就的，民主國家與獨裁國家的分水嶺，即建築在思想自由上，民主國家是教育人，而獨裁國家的教育是製造信徒，一個是在求人格之完成，養成其能思能辨的能力，一個是寧犧牲其獨立判斷能力，而不願放棄信徒的收攬，前者自由教育的結果是人，才，後者統治教育的結果是奴才，茲引實例來說，教育部頒佈大學課程內，有三民主義必修

課程兩學分，如果假定以三民主義爲一種學說來研究，而不含其他作用在內，亦未嘗不可，但何必苦苦強學生以必修呢？按一切課程與學術都是一種豫準的材料，來供學生選擇與運用，絕對不能貫人任何信條，直言之，即不能來造成主義的信徒，因爲學生有充分學問與認識以後，三民主義的信與否，可隨己意之判斷，而定其捨從。若其不相信且更而創出一種四民主義，亦不能禁止的。

有人懷疑思想自由，將放僻邪佚，可以亂天下，如孟子即說過，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，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甯，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……我亦欲正人心，息邪說，距跛行，放淫辭，以承立聖者，予豈好辨哉，予不得已也』，又董仲舒賢良策對策中最後一段亦說道。今『師異道，人異論，百家殊方，指意不同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，法制數變，下不知取守，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，孔子之術者，皆絕其道，勿使並進，邪僻之說滅息，然後統紀可一，而法度可明，民知所從矣』，孟子是想以學術立場，統治思想，而董仲舒是想以政治立場控制思想，前者尙影響不弘，後者流毒數千年，爲專制政權奉爲經典，政教合一的手段，其枷鎖至我們猶未解脫，統治思想，妨害思想自由的發展，其弊我們不深究，但其說有駁斥的必要。

第一，世界上從古迄今決無何種思想不會無懈可擊。換言之，即無論何種學說與主義不能圓滿到無絲毫缺點，因爲人們總有見不到的，且以自己思想爲對的，故任何思想與主義不能不容人批評，往者所認爲絕對真理，至今已修改或推翻者，今之視昔，亦猶後之視今，安知來今日所認爲真理者，不爲他日所推翻，以此今日認某種思想是對的，同時亦須承認不

同思想併爲存在，蓋世界上無絕對無諍之思想。

第二，凡正當的思想是不怕批評的，假使某一黨建立某種主義，而不許人批評，對批評者加以刑罰，思以改治的力量來保護其思想，殊不知思想自身的健全即可爲其保障，無須政治力量作庇護，倘其本身有大可議之處，雖訂於憲章，懸以禁令，亦不足掛悠悠之口，服天下之心，縱武力爲後盾，法律爲藉口，政治爲護符，亦屬枉然，必須相反相成，經得起批評，立得住脚跟，才可以存在。

第三，縱然思想定于一是，可以免除邪說暴行有作，但謬論邪說的標準由何而定，與我善者的善人，與我惡者的惡人，全由主觀來認定，抹殺客觀的存在，這是不是標準呢？須知衆意取趨，爲大家所接受的，方能爲是非之標準，脫邪說中無立足點，則其說自滅，亦不必懸爲厲禁，茲引莊子一段話，『既使我與若辯矣，若勝我，我不勝若，若果是也，我果非也耶，我勝若，若不吾勝，我果是也，若果非也耶，其或是也，其或非也耶，其俱是也，其俱非耶……，吾誰使正之，使同乎若者正之，既與若同矣，惡能正之，使同乎我者正之，既同乎我矣，惡能正之，』這段話證明由主觀來訂是非，是永無是非的。

第四，思想有一奇怪的特質，即必須與相反著相磋磨，否則所必流於腐化，往往一時代思想界最有統一的現象，異說寂聞無聞，而此時代，即爲文化停滯時代，不但此思想界愈定于一尊，學術愈停止不進，泰西文化之蓬勃，中國文化之被謚爲靜止的文明『其故即由於此，西方將宗教政權，與思想分開，於是科學乃產生，科學其所以能進步於無窮，即容許其作

獨立研究，分歧的發展，若思想定于一，便爲思想的自殺。

總之，自由思想是要建立於平等的原則上，自由與平等是雙爪相印，捨一不可，平等就是尊重他人人格，不以我的意見磨滅他人的意見，不以人作工具或奴隸，如此思想自由始能建立，文化始能發揚，民主始能存在，這關係於民族的興衰，亦爲立國的根本。

論學生運動

陳旭麓

任何「運動」的形成，決不是出于幾個人的意志或預謀，由幾個人造成的事實，只能算是人海風波，轉瞬即逝。「運動」是由多數人匯成的一條洪流，在空間是普遍的，在時間是歷久的，每當國家政治腐敗，民不聊生的時候；官僚互相蒙蔽，馴良的老百姓有苦無處訴，現實的醜惡，往往藉着青年學生的正義感發洩出來。暴露那無邊的黑暗，咀咒那些獨夫民賊，他們的呼籲，每每是代表整個人民的聲音。我們看看歷史上學生請願的許多可歌可泣的事實，他們在時代的進程上，確有着決定和突變的作用，因為他們的脚步常勇敢地跨入了另一個時代的前端。

當人類殘忍地演着悲劇，現實的矛盾發展到不能再忍時，如果有人大聲疾呼，說出病源，期能發生振聾啓聵的作用，這正是政治上悔過自新的機會，但是智慧的主張，往往被自私與頑固所淹沒，當宋朝內政不修，外侮日亟，太學生陳東等伏闕上書，請求處死奸宄以謝天下；並請起用李綱以抗金人，這是徽欽之世的藥石，明代的東林書院，初不過二三名流講學其中，終因正義的感召，學士影從，蔚為政團，並不是東林本身有了了不起的魔力，實由于明帝國的昏淫，把一個已經失去了人性的魏忠賢，尊之為大人，殘殺賢良，因此有骨氣的人均歸之東林，明儒學案說：「熹宗之時，龜鼎將移，其以血肉撐拒，設虞淵而取墜日者，東林也。」明帝國終不能自振，隨着歸于滅亡。再說到鴉片戰爭後的滿清，中國的大門被大砲

轟開了，自尊自大的閉關主義，已不可能。一些有警覺的士人，知道如不改絃更張，變法圖強，中國將面臨最悲慘的局面，所以有康有爲等的公車上書，而出現了百日維新政治，在一些不辨菽麥的獨夫中，清光緒帝算是一個比較有所作爲的青年，終因頑固的壓力太大，把一些主張變法的人，殺的殺，趕的趕，因此清代也沒有復興的機會了，宋明清的統治者，不能有所覺悟，結果起死回生的警鐘，變成了嗚呼哀哉的喪鐘。

由歷史的教訓看來，知識青年確是黑暗時代的燈光，然而他們的呼聲，總容易被統治者所誤解，以爲是胡說霸道，危言聳聽，我們相信歷代的當政者都是顛覆無用的傢伙，他們未嘗不明白自己所處時代的危困，只是要維持尊嚴，不願意別人窺破，明知自己有病，不敢說出來，別人說給出來了，反認爲是罪惡，非殺以滅口不可。也因自己不能跟着時代走以改行新政，自己的地位就要發生搖動，爲了既得的權益，非死心塌地的纏着同歸幻滅不可，一念之差，不知鑄成了多少大錯。

「五四」運動離現在還不算太遠，當時的口號；消極方面是反帝反封建；積極方面是爭取民主和科學，這是多麼進步和合理的要求，就是一些頑固的人，也不能否認「五四」光輝的成績，因爲這些都是客觀地存在，由「五四」到現在，已有二十八年的時間，當時的青年，很多已是今日的顯貴，他們自己曾經是學生運動的領導者，應該了解青年的心理，應該知道歷史的演進，當如何把握運動爲改造現實的機會，不知是歷史把他們遺棄了，還是他們趕不上歷史的進程，他們對當前的事實，依然襲取了「五四」時代統治者的舊法子，過去加於他們的，他們又反之于今日的青年，這是人類百思莫解的矛盾。

「五四」的民主鬥爭，一直是在演進着，「九一八」後的抗日愛國運動，仍是「五四」的繼續，在這一段時期裏是反帝的民族主義抬頭。因為要實現民主主義，先須求得獨立自主，才有實踐民主的可能。「七七」前夕，愛國的抗日運動已到了白熱化，大家慷慨地參加了抗日工作，因為抗戰就是運動的答案，抗戰的末期，國內政治出現了許多令人痛心的現象，尤其是官僚政治的無能，所以學生在三十年後隱隱地又喊出打倒官僚的口號，官僚實在是民主的細菌，是人民身上的吸血蟲。抗戰結束，皆大歡喜，無如內戰突起，兵連禍結，學生爲了呼籲和平，必須反對內戰，因為內戰又做了民主的槍子手，欲求民主，則非實現和平不可，假使有人認爲戰爭可以達到民主，除非是採取革命的手段，由破壞而建設，事實上今日大家都在吶喊民主，都在希望民主，可是怎樣走到民主，却有着不同的途徑。有勦滅統一，有革命統一，有和平統一，各有所憑藉，各有各的一套，站在老百姓的立場，只要真的可以一勞永逸，可以使中國走入富強康樂的途徑，革命也可以，勦滅也可以，事實能在眼前，勦滅已是一條走不通的路，假使可以做得到的話，十年前不早已成功了，何至牽連到今日，所以目前可靠的途徑，是由和平達到民主。學生反對內戰，自然就是呼籲和平，正代表了人民普遍的需要。

其實我們今日的學生運動，通過「五四」，應該上溯到康梁領導的公車上書，就當時的環境來說，他們的主張也是進步的，維新運動同樣的是與舊勢力鬥爭，強調一點，當是近世民主運動的開端。我們明瞭了這一意義，就知道今日的學生運動，消極的是反內戰反飢餓，積極的於要求和平以達到民主，無論歐美式的民主或蘇聯式的民主，總要使人民有不虞匱乏